

争取全面完成今年造林育林任务

林业部要求各地抓好雨季造林育林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目前正值我国南北方多雨的盛夏，是造林、育林的大好时机。7月7日林业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充分利用雨季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造林、育林，争取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今年造林、育林任务。

通知要求各地加强领导，大力宣传、深入开展雨季造林。要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我们不仅要搞春季造林，而且要开展一年两季或三季造林，特别是在

挖山整地，既可提高工效，节省劳力，又可蓄水保墒，改良土壤。为今年秋冬和明春造林创造有利条件。

通知还要求各地大力开展雨季育林工作。夏季是幼林抚育的主要季节。多年来，不少地区只抓造林，不管抚育，是造成“小老树”的一个重要原因。各地要下决心用抓造林的劲头来抓好育林，组织群众大力开展幼林地锄草、松土，促进幼林生长。

从事森林调查工作的三十三位同志联名呼吁

各级党政领导要采取坚决措施抢救森林

呼吁书指出：我国森林面积仍在下降

本报讯 7月2日，三十三位从事森林调查方面的科研、教学、生产的同志，联名发出呼吁书，紧急呼吁各级党政领导采取坚决措施，抢救祖国的森林！

呼吁书说，我们参加了两次全国森林清查工作，第一次是在“四五”计划时期进行的；第二次是从一九七七年开始，现在大部分省（区）已基本结束，调查资料正在汇总分析中。从目前上报的湖南、浙江、福建、河北、青海、辽宁六省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自第一次清查到现在约五年间隔期内，尚未成林的新造林地面积和经济林面积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增加的森林面积远小于损耗的森林面积，两者相抵后，六省森林总面积净减10.7%。另据第二次调查资料已基本整理完毕的广东、广西、江西、贵州、云南、四川、安徽、江苏、山东、山西、甘肃等十一个省（区）的材料，森林面积也同样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没有一个省（区）例外。

提高森林覆盖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我国人民多年来渴望以求的事。解放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曾多次号召“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要求尽

贯彻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精神改变边疆地区落后面貌

云南调整政策发挥热带优势保护森林

本报景谷7日电 记者丛中林、江绍高报道：七月五、六两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滇南景谷县，召开边疆地区三地州三县县委书记座谈会，根据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如何调整政策，制订规划，采取措施，充分发挥云南热带优势，尽快改变边疆地区落后面貌。从边疆地区的实际出发，安平生同志提出的特殊政策有：（一）进一步调整粮食征购任务，让农民休养生息。至于超购任务，根据实际情况，自报公议，任务服从政策。（二）西双版纳当务之急是保护森林。为了解决山区

生产队，要适当划一部分集体林和自留山。（五）山区森林资源是发挥热带优势的条件。为了使子孙万代受益，要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立法政策，立法规范，采取具体政策，解决毁林开荒、合理种树、森林火灾、生产生活燃料、合理采伐等问题。

17省市自筹基建资金突破国家指标

有关部门认为，这样下去将会延缓国民经济调整的时间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据中国建设银行最近调查，有17个省市自筹基建资金大幅度地突破了国家规定的全年控制指标。其中有七个省市超过31%到一倍多。

重要任务是要解决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个“老大难”问题。为此，国家今年在削减中央的基本建设项目的同时，对各地自筹的基本建设投资，也比去年压缩了47.8%。但是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一至四月全国

自筹的基本建设投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0%。有关部门认为，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将会延缓国民经济调整的时间。

华总理在东京同泰国炳总理会谈时说

中国站抵抗越南侵略的泰国一边

新华社东京7月9日电 泰国总理今天同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举行会谈时说：“中国站抵抗越南侵略的泰国一边。”

这次会谈是今天上午华总理前往泰国驻日本大使馆将炳总理时进行的。

华总理说：“大平首相是泰国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人民怀念着他。”

华总理赞扬泰国维护独立主权，抵抗外来侵略的正义立场，他指出：“东盟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站在泰国一边。”

在炳总理谈到泰国还存在着遭受越南进攻的危险时，华总理说：“我们将继续站在泰国一边。”

华总理邀请炳总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炳总理也邀请华总理访问泰国。双方互相表示感谢对方的盛情邀请。会见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泰国方面在座的有：副外长阿伦·帕努蓬、驻日本大使威干·瓦达纳恭。中国方面在座的有：副外长韩念龙、驻日本公使王瑞云、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肖向前。

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

印度承认韩桑林政权的行动令人遗憾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今天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印度政府承认金边韩桑林政权表示遗憾。

新闻司发言人说：“印度作为一个不结盟大国，居然承认越南用武装在柬埔寨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客观上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行径起了纵容的作用，这是有损于它的形象的。”

这位发言人说：“在东盟各国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谴责越南入侵泰国的时候，印度政府这一行动是尤其令人遗憾的。”

共产党员吴元生黄占才自愿干苦差事

使一个全县闻名的老大难供销社改变了面貌

本报讯 据《吉林日报》报道，今年3月2日，双辽县卧虎供销社人事干部、共产党员吴元生给县委财贸工作组、县供销社写了封信，请求到条件比较差、供销社比较落后的供销社工作。信中写道：“我是共产党员，受党的培养和多年，愿为四化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并提出改进供销社工作的建议和措施。同时，还向组织推荐茂林供销社人事干部、共产党员黄占才同他一起走。

今年3月25日，双辽县委财贸工作组在讨论干部时，认为吴元生、黄占才有干劲，年富力强，懂业务，便决定让他俩到全县有名的老大难单位——红旗供销社工作，并任命吴元生为党支部书记，黄占才任供销社主任。

吴元生和黄占才到职后，紧紧

依靠职工群众，广泛听取意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摸清商品实有库存和紧缺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商品积压，加速了资金周转；千方百计组织适销对路商品，扩大购销，增加了销售额；清理职工欠款和外部往来资金一千八百多元，增加了流动资金。同时，发动全社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从点滴做起，节约各项开支。截止五月底，这个供销社的费用水平下降2.7%，资金周转加快了0.5%，实现利润七千六百多元，摘掉了四年连续亏损的帽子。

《吉林日报》通讯员



西藏樟木口岸新建一座旅游饭店

普遍建立经济审判庭

新华社北京七月八日电 新华社北京七月八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经济审判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获悉：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地、市、县中级人民法院，除个别外，已普遍建立经济审判庭。各个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约有半数已经建立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经济审判庭，是适应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在法制建设上所采取的一项重要重要措施。过去，在还没有设立经济审判庭的地方，经济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或经济审判庭受理，案件积压，处理不及时，影响经济关系的稳定，给生产发展造成了不良的作用。

十三、十四次特快火车空调设备

本报讯 记者林钢报道：北京—上海间对开的第十三、十四次特快列车，加装了空调设备。舒适、清洁的环境中，完成他们的愉快的旅行。

一座具有空调设备的饭店大楼最近在西藏自治区樟木口岸竣工。新饭店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建筑面积近2,200平方米，可接待100名旅客。它的建成将有助于发展旅游业，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新华社记者顾顺康摄

作为和他们完全对立的革命者，我留在国内已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只好离开越南，继续革命。据我了解，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所发表的意见，在越南人民和军队中产生了相当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正因为这样，黎笋一伙十分愤恨，强令法庭捏造出这一案件。对我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壮声势，借以吓唬和镇压反对他们的人，而目前反对他们的人，无论在国内外，到处都有。今天，越南，黎笋一伙正坐在火山口上，他们正在挣扎，等待着人民对他们的惩罚。

从他们个人来说，我极端蔑视他们，唾弃他们。他们对我们的一切捏造和诬蔑，都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决心致力于革命，为建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仍决心为恢复胡主席所建立，而被黎笋一伙蓄意破坏的越南和中国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友谊而斗争。

这就是我对6月26日在河内捏造出来的案件的意见。

黄文欢同志就越南法庭判他“死刑”答本报记者问

黎笋一伙的捏造和诬蔑毫无价值

他表示继续致力于越南革命和恢复越中友谊

本报讯 越南当局由于害怕黄文欢同志来到中国一事在越南人民和军队中引起的巨大影响，于6月26日在河内对黄文欢同志举行所谓审判，判处黄文欢同志“死刑”。7月9日，本报记者就这件事访问了黄文欢同志。

问：最近得悉，6月26日审判您把您来到中国一事提交法庭审判。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黎笋一伙对我的“审判”，是我早就预料到的。去年8月，我在致越南全体同胞的一封信中就说过：“我知道，我走后，黎笋一伙将加给我这样那样的罪名，甚至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只要我的行动有利于祖国和人民，我就无所畏惧。”

黎笋一伙的法庭加给我的罪名是到中国

就是站到敌人的行列里。这是卑鄙的歪曲。中国正是越南人民极好的朋友。在漫长的三十年中，中国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抗美援朝战争的援助达数百亿美元。抗战战争时期，中国派出了数以百计的干部到越南，献计献策，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派出了几十万人帮助越南人民的后方建设，数以千计的牺牲在美国炸弹之下。因此，只有忘恩负义的人，才把中国称为敌人。

实际上，自从胡主席去世后，黎笋一伙篡夺了党和国家权力并推行了一系列极其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1978年作出反华决议之后，彻底暴露了他们一伙出卖祖国、充当外国走卒的面目，给国家带来极其巨大的灾难。为了实现这些反动政策，他们对反对他们的人横加迫害。

学校从千名报考青年中，择优录取了二十八名青年，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三十二岁。其中有工人，有学生，还有待业青年。考取的学生，都具有一定的音乐素质，主要是学习声乐的。学制三年，课程设置有：声乐、视唱、和声、音乐欣赏和合唱等。教师由中央乐团具有多年演唱和教学经验的同志担任。学生除每周上一次声乐、合唱的课外，其余的课程，都由教师每周二次个别指导。教材选自我国“四四”以来优秀作品和西洋古典作品。学校是因陋就简利用几间琴房为教室办起来的，没有经费，就靠学生的几元学费来维持。

学校从千名报考青年中，择优录取了二十八名学员，最小的有十七岁，最大的三十二岁，其中有人工、有学生，还有待业青年。考取的学生，都具有一定的音乐素质，主要是学习声乐的。学制三年，课程设置有：声乐、视唱、和声、音乐欣赏和合唱等。教师由中央乐团有多年演唱和教学经验的大众担任。学生除每周有一次乐理、合唱的必修课外，其余的课程，都由教师每周二次个别指导。教材选自我国“五四”以来优秀作品和西洋古典作品。学校是因陋就简利用几间琴房为教室办起来的，没有经费，就靠学生交的几元学费来维持。

两个小时。她培养人才的革命情感感染了全校师生。给年轻的学员好的榜样。指挥排练合唱的边宝驹指挥了指挥学员的合唱，每排练一个人员备课，帮助学员理解歌曲的思乐技巧。学员们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刻苦努力。特别是工业学员，作了工作后的疲劳，倒班的困难，有郊区下边区立即赶来上课或到琴房练，在寒天凛冽的严冬，琴房里带着手套、头巾、帽子，手弹僵硬了；在烈日炎炎的盛夏，琴房里他们汗流如雨，喉哑干渴。这些学员的声乐及合唱的学习成绩是显著格、正规，回去后在专业上已显著好转的合作关系较好，初步具备了专业水平了。丰富了学员们的生活到工农兵中去活动假继续招收新学员。

招收新生

社会各方面的扶持成长。

他们认为，学员们的从声乐来听，训练声乐训练要求。不少同学从合唱来看，学员演唱感情充沛，声音和谐，已唱得惟型。最近，学校为实践，决定组织师生们演出。同时，准备今年暑假去乐园的一株嫩苗，需要和培育，使她更加茁壮地

老师病故，
为其料理后
并无什么惊
仍觉得很有
更有云谓，同工同酬大受冲击上，议作
不识，把头一歪，侧身而过，
为学生把老师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为
学生付出的心血，全部忘记了，这
怎不催人深思啊！
这七位同志的行为与这与相反。
他们虽然离校已久，有的已是工人、
教师，也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时间
的推移，地位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
十年动乱，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
，并且深深地爱着自己的老师。相
比之下，他们的行为能说不可贵吗？

老师病故，
为其料理后
并无什么惊
仍觉得很有
更有云谓，同工同酬大受冲击上，议作
不识，把头一歪，侧身而过，
为学生把老师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为
学生付出的心血，全部忘记了，这
怎不催人深思啊！
这七位同志的行为与这与相反。
他们虽然离校已久，有的已是工人、
教师，也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时间
的推移，地位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
十年动乱，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
，并且深深地爱着自己的老师。相
比之下，他们的行为能说不可贵吗？

这些没有音乐才能而没有学习机会的学生，采取业余教唱的形式进行。教师们要花费许多课余时间，付出很大代价。近六年的副校级仲伟同志，除工作外，还亲自教唱，每天坚持两三个小时。她培养年轻学生的革命情感深受教师好评，给年轻的学生树立了好的榜样。指挥排合唱的达宝驹指挥好了排合唱的合唱，每排练一个乐曲教课，帮助学生理解歌曲的思来去，音乐学生们在这样的歌唱训练中格外刻苦努力。特别是工人学员，下了工作后的疲劳、训练的困难，有郊区工厂立即赶来上课或到琴房练唱。在寒来酷暑的严冬，琴房里我们带着手套、头巾、帽子，手弹僵红了；在烈日炎炎的盛夏，琴房里他们汗流如雨，喉壁干渴。这些学员经过一个学期的刻苦的教学效果，学校评比教授沈湘、王福增学员的声乐及合唱的学习成绩是及格、优秀，符合社会上已经显示的专业上已具备专业的合作关系较好，初步具备了专业上具备了丰富了学员们的生活到工农兵中去参加假训练招收新学员。这所学校是社会上各方面的扶植成长。

年的多基本训练,在学习过程中,今年年初,为了检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严良震、李凌同志等一起,听取了汇报。他们认为,学员们从声乐来看,训练声乐专业训练要求。不少同学在合唱看来,学员演唱感情充沛,声音和调,已唱得惟型。最近,学校为出实践,决定组织师生们演出。同时,准备今年暑假在乐园地的一株嫩苗,需要和培育,使她更加茁壮地

了之，和母校、老师老死不相往来；更有甚者，街上路头迎面碰上，权作不识，把头一歪，侧身而过。这些学生把老师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为学生付出心血、全部忘记了，这怎不催人深思啊！

这七位同志的行为与这相反。他们虽然离校已久，有的已是工人、教师，有的已担任了领导职务。时间的推移，地位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十年动乱，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并且深深地爱着自己的老师。相比之下，他们的行为能说不可贵吗？

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相互转化是不是普遍原理？



陈进玉

长期以来，哲学界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矛盾的双方区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主次双方互易位置，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事实上，这种观点对于一部分矛盾具有真理性，对于另一部分矛盾并不具有真理性，因而并不是适用于一切矛盾的普遍原理。

首先，矛盾主次双方的区分并不具有普遍性。把矛盾的双方区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以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为依据的。所谓矛盾双方的平衡或不平衡，即均势或非均势，指的是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含义。矛盾的主要方面或次要方面的区分，作为矛盾双方的不平衡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与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问题相联系的。是不是一切矛盾的双方都存在力量对比的问题呢？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矛盾的双方确实有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例如，在阶级斗争或敌我战争中，矛盾着的双方就有一个力量大小、势力强弱的对比问题。对于类似这样的矛盾，我们把它们的双方作主次的区分，是合乎实际的，是有意义的。然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千差万别的。有一些矛盾，其双方虽然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但无所谓力量大小、强弱的对比问题。对于这一类矛盾来说，我们就不能拿矛盾双方区分为主次的模式去硬套。在磁场的南极和北极的矛盾中，我们看到，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很显然，如果把南极或北极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荒唐的。数学中正和负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西——不是把哪方面当作正，哪方面当作负，都是一样的，不仅在数学中是如此，在物理学中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把正与负区分为主次双方呢？也不能。分析和综合是人类思维运动的基本方式之一，在这两个中，我们也“不应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抛到天上，应当把每一个都应用到该用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8页）

对于这些双方不能区分为主次的矛盾来说，当然谈不上什么主次地位相互转化。

其次，有一部分矛盾，它们的双方相互作用的力量是不平衡的，甲方对乙方的作用和乙方对甲方的作用，是不能平等看待的，这种不平衡性，不只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不同。对这一类矛盾的双方地位及作用，使用“主要方面”或“次要方面”的概念是不科学的。事实上，这一类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相互转化的，所以谈不上什么主次双方地位互换的问题。我们以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这两对矛盾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的基础。在这对矛盾中，双方的地位和作用当然是不能平等看待的。物质派生精神，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对精神所起的是决定作用，精神对物质所起的是反作用。决定作用与反作用，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不同。反作用再大也仍然是反作用，归根到底是决定作用所派生的，它不能取代决定作用。物质与精神之间是谁为主、谁为次的问题，它们之间不是作用力大小的对比问题，而是谁派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所以，把物质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精神称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并且认为它们的这种主次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这种对立，正如列宁所强调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意义。这就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它们之间这种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是永远不能互相转化的。如果否认这一点，等于承认精神可以派生物质，这显然是荒谬的。这样来认识，似乎有点“绝对”，但正是这种“绝对”，才能把辩证唯物论贯彻彻底，才能同物质与精神相互决定的二元论划清界限。诚然，物质经过实践可以转化（不是直接变成）为精神，精神经过实践也可以转化（不是直接变成）为物质，但这不是第一性与第二性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转化。主观唯心主义往往抓住辩证唯物论对精神反作用的承认，把反作用加以无限的夸大，以便从中引出精神派生物质质的结论。加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政治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能相互转化的。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恩格斯在谈到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时指出：“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这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经济对政治起决定作用，而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却只能加速或阻挠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决定作用和政治的反作用不但有量的区别，而且有质的不同。经济处于决定性的地位，而政治处于被决定性的地位。两者之间的这种地位和相互关系是不能颠倒，不能转化的。

有这样一种看法：在一般情况下，经济与政治矛

怎样看待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

蒋映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镇个体经济有了发展。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截至五月底止，全国城镇个体经济有五十万多个，其中，上海、辽宁各有一万多户，天津两千多户（1979年底统计数）北京八百多户。

城镇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几经曲折，三大改造时，大部分组织起合作社或合作组，一部分保留下来。有的虽然入了社，但允许自负盈亏，北京叫做“红帽子”户。1958年把其中一大批组织起来，剩下的从雇工、原材料、价格、税收等方面加以限制。三年调整时期，搞了一次“吐卢”，让一些人退出走南闯北。1966年来了一次“横扫”，以后又割资本主义尾巴，城镇个体经济实存无几。尽管这样，城镇个体经济并没有被“砍绝”，它仍然以这种那种方式存在，在不同的场所为工农业生产 and 城乡人民生活服务，表明了它存在的理由。

近一年来，城镇个体经济又有发展。从北京市的情况看，同上海、辽宁等省市比较，发展要慢一些。东城区187户，崇文区145户，西城区139户。虽然如此，仍然可以看出，城镇个体经济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补充国营经济的不足。西城区二十个家庭缝纫店，每月做衣服五百多件。一户专门裁剪，每月做衣二百多件。有三家专做西服、毛料服、中式便服，技术水平很高。（二）走街串巷，服务上门，方便群众。如上门为病人、老人、婴儿理发，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国营理发店虽有此项业务，但为数极少，且不经常。（三）早开门，晚关门，有的随来随干，国营企业办不到。（四）发挥手工劳动技能，有的机器代替不了。西城区有个做棕人的，他做的棕人，国营、集体商店代销，外国人买的很多。（五）

扩大就业，有利于安定团结。（六）服务态度好，对国营企业有促进作用。城镇个体经济要得到更多一些的发展，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从理论上说，要解决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对于实际工作的开展妨碍很大。过去一些搞工管管理的同志，由于1962年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受到批判，至今心有余悸。其次，城镇个体经济性质不明确，直接影响我们的政策。现行的政策实际上不是鼓励发展，而是限制发展。如税收，现在实行的是十四级全额累进税，征税率最高可达营业额扣除费用后的收入的86%，比过去对资本家征税还重。第三，城镇个体经济性质不明确，影响到原材料不能保证供应，影响到银行不给开户，使许多个体户不能正常经营。第四，影

响到这些个体劳动者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除了本人外，还有子女入党、入学、参军等问题。

城镇个体经济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由于生产资料是个人所有，应当说是一种个体经济。但是，单看这一点是不够的。还要看它的作用及其在整个所有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从作用上看，现在个体经济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与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大体一样性质的作用，都是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价格一般由管理机关规定，原材料由有关行业的公司供应，税收按规定交纳，个人收入同公有制企业相差不多，有的高一些，但付出的劳动也多一些。从比重上看，现在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不准把个体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轨道。基于上述的理由，我国现阶段城镇个体经济，应看成是依附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个体经济，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吗？

叶林生

82年前的戊戌变法运动，史学界历来认为是“改良主义”运动，这似乎已成了定论。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若干年来，人们讲到戊戌变法时，首先总得小心翼翼地声明：“一般来说，改良主义运动是反动性质的运动，但在戊戌那个时候，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有时，则换个说法：“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与彻底的革命路线是对立的”，但在当时，戊戌变法却是“具有爱国性与进步性的政治运动”，等等。

这些表述，无非是说明：“在反动”的一般性之下，存在着具有“进步性”的特殊现象。

所谓“反动”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之谓也。戊戌变法既“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为什么不能直率地肯定它的进步性，偏要给它戴上“改良主义”的帽子呢？

在评述戊戌变法时，有的同志甚至说：戊戌变法运动“最大的教训就是：即使是含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运动，也是要不得的”。到了十年浩劫期间，改良高潮性直截了当地说：戊戌维新“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戚本禹的叫嚣固然不是有良心的影射，但是，从戊戌变法到帝国主义时代”这个前提提出，戚本禹重复的，只不过是“改良主义”的题中之义。

既是“要不得”，又认为“绝不是”出路，那么，在革命条件还不具备、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就只能“耐心地”等待、忍耐着。这岂不叫人糊涂！

用“改良主义”来限制戊戌变法运动，我认为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观察事物、观察社会现象必须按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来具体分析它所起的历史作用。因此，研究戊戌变法也必须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考察。

改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中机会主义的一种恶毒。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时，指出他们以改良主义顶替

社会主义革命，梦想通过“改良”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是数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的特征所产生的，在这个时期，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摆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但也丧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绪”。（《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9页）第二国际的这种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从来就是反动的，并不曾有过什么进步性。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公式去套用历史上的一切。

事实上，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都不过是以一种剥削制取代另一种剥削制。渐变是反动性、革命性和改良，两种形式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世界历史上，日本的明治维新似乎并不能算作一次突变形式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国历史上，如果按照西周封建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以说是通过维新之路来实现封建化的；如果按照秦汉封建说，那么，秦也是通过商鞅变法等改革的道路逐步走向封建化的。

承认这些历史的进步性，似乎都没有必要扣上“改良主义”的帽子。那么，对戊戌变法何以需要如此特别谨慎呢？那大概是因为“世界已发展达到帝国主义时代”吧，或者是正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出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吧。这无疑是事实。但是，承认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比世界形势整落后了一个时代，历史潮流、世界潮流要求中国进步、发展。

戊戌运动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发起的呢？一方面强邻迫近，割地赔款，国丧丧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结果，割让台湾等岛屿，赔款白银二万万两；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大；紧接着，帝国主义纷纷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中国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掌握清廷实权的封建顽固派却抱残守缺，认为“夷法不足效”，“祖宗之法不可改”。不但资产阶级民主、民权之风吹不进，而且，连剪发、穿西服都视为“大逆不道”。他们反对任何改

的决定要求，这个要求是不可抗拒的。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发展量的阶段，而且集中表现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质变阶段，即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只承认量变阶段是经济决定政治，而否认质变阶段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政治来决定的，因此，它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否定经济与政治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相互转化，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吗？不是。历史上的机械唯物论者，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历史领域里他们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根本没有达到经济决定政治这样的认识高度，因此，所谓是否承认一定条件下政治决定经济，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无从谈起。辩证唯物论与缺少辩证法的唯物论在经济与政治关系上的分歧在于，前者承认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而后者否认这种反作用。至于是否承认政治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决定作用，这个分歧的实质在于，是否把辩证唯物论坚持到底。

再次，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方面转到次要方面的位置上，相应的次要方面又转到主要方面的位置上，结果事物的性质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这种例子有没有呢？有。例如，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何者占优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地位上，就决定了政权的性质，或是资产阶级专政，或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必须看到，一般来说，事物的质变，是旧的矛盾体为新的矛盾体所取代的过程。在奴隶社会中，存在着奴隶主阶级与奴

隶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奴隶主阶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奴隶阶级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当奴隶主被封建制所取代时，奴隶阶级并没有转化到矛盾主要方面的位置上，即没有转化到原来奴隶主阶级所占据的统治地位上，而是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同归于尽，它们的地位分别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所取代。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是社会制度的质变，这种质变并不是由旧的矛盾体双方主次地位的互换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有些矛盾的双方有主次之分，主次双方的地位可以相互转化；有些矛盾的双方不能用于主次双方这种模式去套，也无所谓双方主次地位的相互转化；有些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互换会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有些事物的性质的变化并不是原来的矛盾体双方地位的互换引起的，而是由旧的矛盾体为新的矛盾体所取代来实行的。因此，所谓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相互转化，并不是适用于一切矛盾的普遍原理。任何一个带有真理性的认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把它运用到它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就会造成错误。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对于哲学普遍原理的概括和表述往往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有的哲学结论，人们原来认为是普遍原理，但随着时间的转移，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是合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事实表明，对于哲学普遍原理的概括和表述，必须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对于那些经过实践检验已经证明是不准确的或错误的部分，应加以修改、补充和发展，使之更加精确，更加完善。

革，反对任何进步。封建贵族可以刚毅为代表，其理论是：‘吾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宁可让帝国主义瓜分，也不能让社会前进，不能让人民稍稍抬起头来。官僚可以张之洞为代表，认为：‘虽分割之后，亦尚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同上）只要有官可做，帝国主义分割与我何干！他也反对任何改革，他写了一篇《劝学篇》，拼命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之道，认为‘民权之义’，是‘召乱之言’，‘无一益而有百害’。

一方面因落后而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前进，自甘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历史也容许“假设”，那么，按照量变革命的方案，当然急需一次彻底的革命，以推翻反动腐朽的封建王朝。

但谁来领导这次革命呢？旧式的农民革命，这时已担当不起新的历史使命；当时的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无产阶级革命还远没有酝酿成熟；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更弱小，远没有走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所以，那种“假设”尽管很革命，但终究不过是假说。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奔走呼号，冲破强大阻力，著文章、出书刊、办会社、倡民权，冒着“非圣乱祖制”的罪名，提倡变法维新，企图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无疑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对此，历史似乎倒并没有否认。但人们往往在承认这个“进步”的同时，又总是把“改良主义”搬出来，强调一下它的“反动”，和它“同革命路线是对立的”。历史事实是：戊戌年间，资产阶级维新路线还没有形成，维新运动的对立物是封建顽固派，在当时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下，维新运动并不是什么“反革命”，强调这种“对立”，除了表明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没有忘记“革命立场”之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人类的历史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也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没有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作用，也就不可能出现辛亥革命。因此，后人研究历史，不能脱离中国当时的实际，更不能搬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概念去硬套戊戌年间的维新派和维新运动。

孙叔平著《中国哲学史稿》上册出版

孙叔平著《中国哲学史稿》上册出版

孙叔平著《中国哲学史稿》上册出版

《洗冤集录》出版

郭朋著《隋唐佛教》一书最近已由齐鲁书社出版。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融合，到隋唐才在中国真正扎了根，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隋唐佛教，上承南北朝，下启宋明，是中国佛教发



